

英美大学人文科学院系向来要求年轻一辈教师著书立说才有希望升级，有希望拿到终身教职。著书立说说的是厚厚一整部书，所谓full-length book，所谓monograph，还必须是

是有名望的出版社承印出版的。哈佛、柏克莱几家名牌大学听说还规定老师要出版两部这样的著作，审核终身教职的委员会才肯审议升级事宜。

翻看《London Review of Books》，翻到John Sutherland写的《日志》，说是人文科学院系早已成了生产专题著述的一门工业了，学术报刊上出版社的广告一块接一块推介一本接一本的专著，不要说细读，连随手翻一翻都翻不了那么多了：“They are the rungs on which a career academic rises”：职位顺着这道高高的书阶升上去。学人算是用了未经出版的博士论文谋得教职，再用没人阅读的学术著述晋升职级，市场上从此堆满这些没人买的书。萨瑟兰还说他惊叹的是这些学人真多产，写书像海狸筑坝：“They write books as beavers build dams”。

一位过去在美国大学图书馆里做事的朋友对我说：出版学术书籍的大学出版社都在承受赚钱的压力了；各图书馆跨馆借书的制度也降低了各图书馆购买同一种学术书籍的数量；网上资讯的发达更改变了搜寻参考书的模式；三者并攻，学术书籍的功能只剩下当梯阶去晋升职级了。难怪萨瑟

在我采访过的女性人物中，周小燕先生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也最令我感佩难忘。我在为周先生写的报告文学《蚌壳里飞出的夜莺》的开头写道：“面对这样一位老人，我时时慨叹自己笔力的不济。依我这支孱弱之笔，又怎能描尽她人生的全部，去是他们的负担。他们还

希望之火不灭

殷健灵

燃烧在她生命的各个时期，哪怕在人生的最低谷都不曾熄灭过。

“文革”期间，周先生饱受摧残，几乎连性命都被夺了去。我问她，在那个时期有否对人生丧失希望？周先生答：“没有，因为我是乐观的。我始终不相信‘四人都’会横行下去。开大会，把我关进牛棚。因为有很多人和我一起被关进去，我不觉得紧张，如果我一个人，我会紧张。我就觉得他们在胡闹。我爱祖国，也爱党，却被看作敌人。我怀疑他们不对，虽然我说不出道理来，但直觉他们这么做不对。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有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总是看到黑暗中的一线亮光。”

丈夫张骏祥先生去世后，周先生的一双儿女都不在国内。问她是否感到孤独，周先生沉吟片刻说：“当然想他们。不过，他们不是我

兰说有人建议学人以单篇文章取代整部著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八篇论文等于是出版两部著作，晋升评核改以这些论文为依据。

前几年跟两岸几位老作家吃饭，席上一位老先生说：“什么著作！书卷气的硕儒一生只写几篇文章都比一些博士教授的等身著作强十倍！”老先生说大学出版社真应该拨六成经费出版学院小说！只留四成经费出版学术著作擦亮大学招牌：“只有这样，人文学科的老师才能在小说的撰写过程中提升他们的入世技巧，打进市场；经费所限，千挑万挑挑出来的学术著作必然都是传世的巨构了！”一位女作家笑说老先生博读英美学院小说，走火了。

我只读过很少几本campus novels。五十年代Mary McCarthy的《The Groves of Academe》写文学教授给校长解雇，说他是共产党。那是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时期的作品，文评家都说字字发亮，才华了得，我读完丝毫没有惊艳的醉意。

七十年代看完Malcolm Bradbury那本《The History Man》我倒是倾倒了，全书只顾叙述，不作议论，英文时态的破格破得新鲜，英国南部红砖学院那位社会学讲师Howard Kirk让他一刀一刀雕活了：睡学生睡同事睡学术睡得荒谬，他妻子只好跑去跟伦敦一个年轻男演员睡周末睡到月冷！我跟Malcolm Bradbury吃过饭，没好意思问他有没有哪家大学请他当教授。

怕怠慢了这位我从内心里崇敬的老人。在采访写作中，我得到了音乐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要提一下的，是周小燕先生为我提供的《中国之莺》一书，提供了翔实资料。对此书的作者朱永珍女士，我要特别致谢。文章在新民晚报连载后，很多读者被周先生的事迹感动，并希望我转达对周先生的敬意。我和所有的读者一样，感谢周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一切。

当年一卷沉思录，启我愚蒙获理知。病后余生再努力，不断沉思与反思。术前一日，偷偷到天地新书总汇，购得王元化先生新书《沉思与反思》，置诸床头。病后当再努力反思，不敢懈怠。

当年一卷沉思录，启我愚蒙获理知。病后余生再努力，不断沉思与反思。术前一日，偷偷到天地新书总汇，购得王元化先生新书《沉思与反思》，置诸床头。病后当再努力反思，不敢懈怠。

我曾从南京出发，乘轮船溯江千里，在江轮上尽情地观赏长江上的旭日

第一次引起我注意的日出，是在九江那宽阔的江面上。我漫步到船后的甲板，伸展着懒睡一夜的肢体。忽然，我被眼前的景象摄住了：一轮火红的旭日正从宽阔的江面上慢慢浮出，刚见到一个新月似的红边，一眨眼，已有半个吐出波涛之上了；再一凝神，一轮红日已跃上江面，照得大江金红一片，景色壮美无比……

这一次日出，因为我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太阳出得太快了，使我来不及仔细观察。而另一次日出，则因为云朵与太阳的掩映，使我看得很长久很细致。

那是长江流经辽阔的江汉平原时，我从船窗看到的一次瑰奇的日出。东边天上先是一种像牛乳似的淡白色，然后从淡白中泛出晕红的鱼鳞云，再吐出一缕玫瑰红，慢慢显出圆的轮廓。上边的鱼鳞云如仪仗队，环护着，下边有几圈黛色云托着，中间还有几条环带似的黛云，环抱着旭日，增加了它的妩媚。黛色云愈来愈细，像几条带子渐渐消去，旭日露出嫣红的羞涩的脸蛋，随即闪射出金色的光芒。过了不久，黛色云又似汹涌的波涛一样漫过来，以多变的诡奇的姿态把旭日吞没，但旭日的光辉透过云边向四周散射，使黛青色的云边都镶上了玫瑰红。在黛色云的烘托环卫中，旭日更显得妩媚而壮观。

日出，这种日常可见的自然现象，它把无限动人的美丽色彩与英气勃发的，昂扬、豪壮、磅礴的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长江客轮上，我虽无意去寻视日落的景色，但无意中，一次日落景象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那是船离南京的当天傍晚，在船的右前方，夕阳如旭日一样瑰红。波光粼粼，像神女的闪烁异彩的长带。那夕阳慢慢地、毫不羞怯地向人间笑着，退隐到绿树青山后……

我的心头自然涌起了“夕阳无限好”的诗句，但紧接着的那句“只是近黄昏”却未免太悲凉了。我在此时想到了叶剑英元帅的诗“满目青山夕照明”，这种诗意才与眼前的景象相合。

人们常常把人生的终结比为“太阳落山”，这似乎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是只要人生是充实的，“近黄昏”也给人一种自信的、微笑的力量。这样的“落日”，无异于孕育着精神上的新生。眼前的落日美景不正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吗？

人的一生确实像日出日落一样，有生有死，有出有落，自然规律无法违背。但正因为如此，真正的人的一生，就应该像日出日落那样，出得瑰丽雄奇，落得笑颜长留……

天内一抽去身乃自由，常言「病去如抽丝」真不虛也。

当年一卷沉思录，启我愚蒙获理知。病后余生再努力，不断沉思与反思。术前一日，偷偷到天地新书总汇，购得王元化先生新书《沉思与反思》，置诸床头。病后当再努力反思，不敢懈怠。

先进篇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学者们指出，前两句也是孔子说的，“子曰”应移到最前面。季氏，鲁国“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代）之一，此处指当时实际掌权的季康子。周公，非西周开国元勋周公旦，而是世袭他爵位的子孙，即春秋时的周公。求，冉求，字子有，是与子路并列孔门“政事”科（先进篇）的大弟子，善理财，当时在季康子家任总管。从先进篇冉有说“使足民”来看，冉有本来具备一定的富民思想。

此章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孔子说：“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还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进一步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非吾徒也”比“朽木不可雕也”（公冶长篇）要严重得多。宰我白天睡觉，受到孔子责骂，还只是“内部矛盾”；而冉有的所为，在孔子看来已属大是大非问题，所以孔子才把他逐出门墙。不过，愚以为孔子终究有点儿指桑骂槐的意思，他内心的愤怒其实更多是针对季康子的。

要想全面、正确理解此章，需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春秋时期，鲁国的税赋制度改革最早。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实行“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也就是开始按田亩征税。过去只是征收公田十分之一的税，不征私田，现在公田、私田一律征税。过了四年，鲁成公又“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也就是开始按“丘”（《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征收军赋，即车马兵甲等军需费用。前五三七年，“三桓”把三军改为二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子各一，皆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也就是说，“三桓”控制着政权和全部军权、财权，朝廷只是靠进贡来维持，而季氏一家占有全国一半的军力、财力。鲁哀公时，“初税亩”已实行百年，税赋越来越重，已按十分之二征收，但鲁哀公还说“二，吾犹不足”（颜渊篇）。人们只能认为，税收都掌握在“三桓”手中，进贡给公室的很有限。当然，税制实际上并不完善，也不彻底，大量新增的私田都能逃税。执政的季康子想进一步改革税赋制度，以取得更大的家族利益。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前四八四年冬天，六十八岁的孔子周游列国后刚返鲁不久，季康子派冉有去向孔子征询对税赋制度改革的意见，孔子回答：“我不懂这个。”冉有问了三次，最后说：“您是国家元老，等着您拿主意办事，您为什么不肯说呢？”孔子还是不答，后来私下对冉有说：“君子办事，要用礼来衡量。给予下面要力求丰厚，一般的事要做得适中，税赋要尽量微薄。如果这样，那么按‘丘’征税也就够了。如果不以礼来衡量，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按田亩来征收税赋，还会不够的。季康子想要办事合乎法度，那么有现成的周公典章；如果想随意行事，又何必来问我呢？”季康子不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孔子“非吾徒也”的话，就是在颁布“用田赋”之后说的。

孔子主张少征、薄赋、富民，季康子想要广征、重税、为己，结果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篇）。冉有不仅没有劝阻季康子，或辞官而去，而且为虎作伥，孔子开除他合情合理。

荔枝、樱桃、橘子、荸荠、石榴、菱角和河蚌、虾、海螺、螃蟹等。这些瓷塑造准确，大小与原作相当，所施彩釉细腻逼真，给人以宛如真物再现的新奇精巧的艺术享受。此类象生瓷塑除少数单独成器外，一般多黏结于圆盘或高足盘上，供宫内御用陈设和玩赏。

明起刊登一组《加油，中国女足》。

「非吾徒也」

白子超

日出日落

叶公觉



论读新读

病中杂咏

商友敬



清乾隆款白地粉彩百果盘

黄卫文



将在豫园举办的“紫禁瑰宝——故宫博物院藏清宫赏玩展”上有一件白地粉彩百果盘十分有趣。这件清代乾隆时期江西景德镇御窑厂所造的百果盘，折沿，浅弧壁，圈足。里外施白釉，里口沿印缠枝莲纹一周。盘心黏结瓷塑粉彩象生果品核桃、枣、荔枝、樱桃、荸荠、石榴、花生、瓜子、菱角和螃蟹一只。底足内施白釉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的鼎盛时期。此时，以景德镇官窑为代表的制瓷业，不仅精于仿制历代名瓷，而且在继承和发扬前代瓷器艺术的基础上创新出众多新奇的品种，把清代制瓷业推向创造性的阶段。“象生瓷”即是当时的新作，它以瓷塑的方式摹仿自然界的花果或水生小动物的形象，如：核桃、枣、栗子、花生、瓜子、莲子、